

国学经典丛书

长短经 上

[唐] 赵蕤 著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

国学经典丛书

长短经

上

[唐] 赵 蕤 著

刘国建

王雪黎 注译

刘 华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长短经(上下)/(唐)赵蕤著;刘国建,王雪黎,刘华注释.
郑州:中州古籍出版社,2007.4
(国学经典丛书)
ISBN 978-7-5348-2528-6

I. 长… II. ①赵…②刘…③王…④刘… III. ①政治 - 谋略 - 中国 - 古代②长短经 - 注释③长短经 - 译文
IV. D69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17915 号

出版社:中州古籍出版社

(地址: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:450002)

发行单位: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:郑州市毛庄印刷厂

开本:640mm×960mm 1/16 **印张:**32.75

字数:400 千字 **印数:**1—5 000 册

版次:2007 年 4 月第 1 版 **印次:**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(上下册):38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长短经

前言

在汗牛充栋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，有关谋略理论的阐释著作占有相当的比例。抛开正史、编年史，单说诸子百家，至少儒家、法家、道家、兵家、纵横家等这些地位显赫的学派，其学说的核心便是治国用兵之术。这治国用兵之术便是中国古代谋略的中心议题。或许，分久必合、合久必分的政治版图的嬗变，异姓禅让、黄袍加身的朝代更迭，血雨腥风的宫廷厮杀，诸侯相争的战争搏击，以及对万世一系的帝王梦的渴望，为往圣继绝学、为万世开太平的责任感，甚至于对立德立功立言立名的冲动，对功高震主的恐惧，对成功的立身处世之术的向往，都可能是催生发达的中国古代谋略思想的土壤。不管什么原因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：谋略已成为中国古代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外交以至于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甚至在人类生活的每一处都能找到它的踪迹。难怪席勒说谋略和爱情才是人类生活的永恒主题。

大体说来，中国古代谋略经典可分为三大派系：法家谋略侧重于政治领域，以《韩非子》为其代表；兵家谋略侧重于军事领域，以《孙子兵法》为其代表；纵横家谋略侧重于外交领域，以《鬼谷子》为其代表。三家齐辉，各伸所长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导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、可歌可泣、令人叹为观止的历史活剧。然而，合流三家，融汇诸子，删繁摘要，高屋建瓴，集中国古代谋略思想之大成

的，当首推唐代赵蕤的《长短经》了。

赵蕤，字太宾，梓州人，为唐朝中期的一名隐士。赵蕤操行高尚，唐明皇屡征不仕，潜心研读，学问博大，桃李满天下。据说，唐代一大批文臣武将即出自赵蕤门下。他弃绝守成，主张变通。他说：“三代不同理，五霸不同法”；“御世理人，罕用沿袭”。他以历史学家的博大、政治学家的敏锐和谋略学家的睿智，纵观上起尧舜下迄隋末的活生生的历史事实，分门别类，从六十四个方面，发思古之幽情，究成败之得失，淋漓尽致地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和人生的智慧，升华出了博大深邃的谋略思想，令人体味无穷。以文治武功彪炳史册、号称“十全老人”的乾隆皇帝读了《长短经》，兴奋不已，欣然题诗，在盛赞《长短经》的同时，不禁发出了“既是梓州善经济，不应辟召又何焉”的感叹，惋惜之情溢于言表。

《长短经》的内容大体分为五个方面：识人用人之真谛，是非正反之辨析，历史画卷之展示，人生智慧之杂说，用兵理论之总结。其中尤以识人用人方面着力最重。

第一，识人用人之真谛。这是一个亘古恒新的课题。赵蕤无成见，无偏私，登临绝顶，博采众家，融会贯通，从品目到量才，从知人到善任，从君德到臣行，从主体到客体，从上级到下级，从正面到反面，多方位多视角观照中国古代的人才理论，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代人才理论的博大与精深。中国古代的人才理论虽然还不能纳入现代人才科学的范畴，但它极富智慧，极富感情；它世故，它老到，它生动，它有趣；它举一反三，它灵活多变；它既重视一般原则，又强调因时而变，因地而变，因人而变，因机而变；它史论结合，娓娓道来；它高屋建瓴，铿锵有力。识人，它从人伦亲情着眼，渐次推进，直透人的心理深层；用人，它循着理性光芒的照耀，以事功为大，不以个人好恶定夺。总之，它重情而入理，狡黠而不诡诈，较真而不失大度。

重情而入理。人是情感之物，再刚强再粗暴的人，也有他细腻柔弱的情感世界。所以，推知为人，而直视人的情感世界，是中国古代人才理论的一个特点。人生天地间，父、母、兄、弟、妻、子是天伦之亲，古代称之为“六戚”。如何对待“六戚”，就成为古圣先贤考量人的品质的一个重要尺度。试想：一个无孝于父母、无爱于妻子、无怜于兄弟的人，还谈什么忠？还谈什么友？还谈什么情？还谈什么义？所以当齐桓公向病危中的国相管夷吾请教国事时，管夷吾力劝齐桓公驱逐那些不惜煮子为桓公、毁身为桓公、不奔父丧为桓公的人，也正是基于这种天伦之情的考虑。所谓“忠臣必由孝子出”，这句中国古代的至理名言，正是披沙拣金的经验之谈。这是重情。

所谓入理，是说情中有理，重情而不重偏激之情、疯狂之情、如痴如醉之情，而是大众之情、普天下之情。这情，便是入理之情。伯夷、叔齐谏阻武王克商不果，义不食周粟，饿死于首阳山；尾生与女约会，女子失约，大水将至，尾生义不爽约，抱柱而死；孝子曾参不肯离父母半步，如此等等，皆属偏激之情、疯狂之情、如痴如醉之情。这情怀令人感动，却不令人羡慕；它不是中国古代鉴识人才的价值尺度。中国古代鉴识人才的价值尺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实用的、功利的，因而它贵忠、贵能、贵智、贵谋、贵节、贵义、贵胆、贵勇、贵廉、贵信，贵一切有利于事功的品质。惟其如此，巧言令色、矫情伪饰、顺风转舵、阿谀奉承等，就为充满了理性光辉的主流人才观所不齿；相反，“听其言而观其行”才是中国古代鉴识人才之术的主心骨。这是“重行”；“重行”才是最具特色的“入理”。所谓“远使之而观其忠，近使之而观其敬，烦使之而观其能，卒然问焉而观其智，急与之期而观其信，杂之以处而观其色”；所谓“通则观其所礼，贵则观其所进，富则观其所养，听则观其所行，近则观其所好，习则观其所言，穷则观其所不爱，贱则观其所不为”；所谓“喜之以验其守，乐之以验其僻，怒之以验其节，哀之以验其仁，苦之以验其志”，

如此等等的观人之法，真可谓用心良苦，费尽心机。这种将观人由感性上拔（至理性）和下沉（至实践）的方法充分说明了中国古代人才理论的智慧 and 成熟。

狡黠而不诡诈。孔子说：“凡人心险于山川，难知于天。天犹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，人者厚貌深情。”这位睿智而世故的圣人在识人方面也时常走眼，所以才有“险于山川”、“难知于天”的感叹，才有许多关于识人用人的警句名言。作为经验的总结，中国古代的人才理论在识人方面可谓言行、容貌、情志均观，真假、虚实、奇正并用。诸如以言钓情、以事钓情、以物钓情、以志钓情、以视钓情、以色钓情，所谓揣情，所谓摩情，所谓于人甚喜之时极其欲，于人甚惧之时极其恶，以至于用取悦、用激励、用利益、用谄媚、用名誉、用廉洁、用成功、用信用，如此等等钓取人的心理的方法，都颇有些狡黠刁鬼的味道。但不能说是诡诈。想想看，对于那些“厚貌深情”的人，对于那些紧闭自己心灵大门的人，没有“引蛇出洞”的方法，没有投放竹竿引人上爬的方法，没有诱导，没有激励，不“苦其心志”、“饿其体肤”、“空乏其身”，不置之于一定的场景中，是难以了解其内心情怀的。这些方法或心理暗示，或实践验证，是鉴识人才的必由之路，谈不上诡诈。诈者，欺也。上述方法谈不上欺。所谓“听其言而观其行”之“观行”，不仅仅是被动地“等着看”，还在于主动出击，去发现、去验证、去品评、去举荐，于是便有了这五彩缤纷、实用而有趣的鉴识人才的方法。

较真而不失大度。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用人方面。较真，是说中国古代对人才的品评与论列繁富细腻，不厌其烦。所谓人才十二种，偏才十二种，所谓庸人、士人、君子、圣人、贤人，所谓英、俊、豪、杰，所谓英，所谓雄，所谓英雄，所谓人臣“六正”、“六邪”，以及各色人等的长短优劣，不能一一。这便为人才的鉴识和使用提供了多角度、多层次的参考坐标。但中国古代的人才观决不追求完美。

如果说追求完美的话，它追求各得其用的完美，而不追求人格的完美。深得汉高祖刘邦器重、并曾为刘邦六出奇计的陈平是“盗嫂受金”之徒，魏武帝曹操“唯才是举”、余者不问的求贤令多少有些饥不择食的嫌疑，但这些故事之所以被传为历史的佳话，正是因为刘邦和曹操具有宽广的胸怀和驾驭人才的高超技能。

不但不追求人格完美，相反，对于具有完美人格的所谓贤人君子往往会束之高阁。管仲病重，齐桓公向管仲请教鲍叔牙是否可以接任国相，管仲说鲍叔牙清正廉洁，不与不如自己的人为伍，看到别人的缺点一辈子忘不掉，他决不适合为相。战国时期的苏秦奉燕王之命出使齐国，劝说齐王归还了燕国的十座城池，燕王十分高兴。有人便向燕王谗毁苏秦，说苏秦是一个时常出卖国家、反复无信的贼臣，燕王因此疏远了苏秦。苏秦便向燕王说：我的不诚信的品质正是大王的福气，假设我守信如尾生，廉洁如伯夷，孝悌如曾参，也就不可能来侍奉大王您了。守信的品质是自我修炼的结果，不是进取成功的方法。苏秦的话尖锐而深刻。黄石公说：“使智、使勇、使贪、使愚。智者乐立其功，勇者好行其志，贪者决取其利，愚者不爱其死。因其至情而用之，此军之微权也。”伊尹负责土木建设时，让膀大腰圆的人背土，让瞎子推车，让驼背的人涂抹，各得其宜。这便是黄石公所说的“因其至情而用之”。魏武帝曹操说富于进取精神的人未必有高尚的德行，具有高尚德行的人未必有进取的精神；难道陈平算得上德行高尚的人，苏秦算得上守信的人吗？然而，陈平辅佐刘邦奠定了汉王朝的基业，苏秦使得弱小的燕国自强于诸侯之林，这是用人之长的结果。曹操老辣，目光如炬，所言颇得用人之要。

不追求完美，“因其至情而用之”，这便是中国古代的主流人才观。

第二，是非正反之辨析。这部分赵蕤虽然用墨不多，但却是全书的灵魂之所在。《长短经》之被称为“反经”，也正是因这部分（卷

三“权变”内有“反经”一篇）而得名。“是非之辨”与“正反之辨”并无本质的区别。如果说有区别的话，“是非之辨”主要是指对同一个人、同一件事、同一命题、同一理论、同一方法、同一学说、同一学派的截然不同的看法；“正反之辨”则主要是讲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，事物在其发展的进程中逐渐走向了其反面。或者以“正”之名行“反”之实，或者近观为“正”、远观为“反”，或者成中有败、是有非、进中有退、强中有弱，如此等等。“是非之辨”与“正反之辨”往往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，甚至合二为一，浑然莫辨。是与非、正与反的辩证逻辑贯穿于《长短经》的全篇。

是非也好，正反也罢，核心就是一个“变”字，没有纯粹而又纯粹、笔直而又笔直、亘古不变的事物。无论粗细之理、仁贤之用、德才之比、上下之宜，无论刑罚与教化、治家与治天下、窃家与窃国、游侠与儒士、用才与妒才，都有个是非之说、正反之论。赵蕤说，仁、义、礼、乐、名、法、刑、赏这八宗，是五帝三王治理天下的方法。所谓仁，要求泛爱博施，却容易催生偏私之情；所谓义，要求守节立行，却容易流于哗众取宠；所谓礼，要求恭敬谨慎，却容易流于繁琐怠慢；所谓乐，能够调和情志，也容易使人生发淫逸放荡之心；所谓名，可以用来正尊卑之序，也容易使人生矜持篡逆之心；所谓法，可以使众人整齐如一，也容易使人越法背分；所谓刑，可以震伏那些不服法令的人，也容易导致凌辱、暴虐百姓的行为发生；所谓赏，既可以激励人们尽忠效能，也容易导致人们之间的纷争。

慢说如此复杂的问题，即便是众人为之欢呼、看似毫无争议的成功或胜利也未必就是真正的胜利。赵蕤举例说，战国时期，秦、赵“长平之战”，赵国失利，四十万将士向秦军投降。而秦将白起背信弃义，将四十万将士全部坑杀。有人问：白起所为可谓奇将之举吗？魏人何晏对此论议颇详：白起诱降坑杀四十万赵军之举，岂止是“残酷”一词能概括得了的吗？恐怕他以后也难以重新得志了！假使赵国

将士预知降而必死，必定戮力而战，即便赤手空拳犹可畏惧，更何况四十万披坚执锐之士呢？诸侯各国看到降秦的将士头颅依山，归秦的士卒骸积成丘，则日后交兵，何众肯服，何城可下？必定根绝杂念，与秦决以死战。所以白起之举虽然损灭了赵国四十万生命，但相反的结果却强化了诸侯各国团结抗秦的决心。这正是欲得一朝之功，却强天下之守。从整个战争态势上说，白起是在凯歌行进之中削弱了自己的优势，军事上表面的胜利反而阻塞了秦国政治、外交的道路，从而延迟了统一天下的进程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赵国虽然败于长平，但并没有亡国，假若重整再战，再出一个像马服君这样的大元帅，究竟鹿死谁手，恐怕就非往昔可比了。此后，秦国之所以不敢加兵于邯郸，不仅是因为赵国又请出平原君做统帅，秦国畏惧平原君，更为重要的是秦国惧怕各诸侯国联合救赵，秦国对此心知肚明，只是讳莫如深，不便言说罢了。如此说来，白起之举，何“奇”之有呢！

这便是“是”中之“非”、“正”中之“反”。所以，无论是儒家的仁爱，道家的无为，法家的严峻，兵家的神奇，纵横家的诡谲，还是仁、义、礼、乐、名、法、刑、赏，均各有所长，各有所短。运用之妙，贵在“适变”，因人而变，因事而变，因时而变，因地而变，因情而变，才能缓解“是”中之“非”、“正”中之“反”。赵蕤在《时宜》篇中特别指出，事情往往有目标相同、方法相同，但造成的结果却截然不同的情况，这并不是因为方法本身有什么问题，而是时势不同造成的。所谓时势之不同，有“形”之异，有“势”之异，有“情”之异，有“情”、“形”、“势”之异。所以须“随时变通，不可执一矣”！赵蕤“趋同势异”之论，取材精当，对比鲜明，人物生动，议论充分，将其视为全书的点睛之笔再恰当不过，请读者诸君注意。

第三，历史画卷之展示。这部分共有三篇：《霸图》、《七雄略》、《三国权》。三篇从三个层面或三个视角总结了历史的经验。这是赵

蕤对历史经验的战略性思考和总结。

《霸图》以人物为经，以史实为纬，从周朝八百年的盛衰历史到秦朝帝国的崛起与崩溃，从刘邦龙兴沛国、项羽垓下自刎到汉室的覆灭，从三国鼎立到晋室一尊，从六朝的急速更替到隋朝的顷刻瓦解，其间开国皇帝的雄才大略，末代君王的暴虐荒淫，成功的轨迹，失败的辙鉴，英雄的创业与悲欢，百姓的力量与心愿，以及历史行进的大势脉络，赵蕤都悉数道来。他总结前人的观点，认为帝业之兴，有待两条：一为大势所趋，二为人心所向。

所谓大势所趋，指的是天命大势。他引述干宝之论：帝王的兴起，有待天命相助；朝代的更替，亦非人力可为。尧舜在部落内部禅让，体现的是文德；汉魏异姓间的禅让，则是态势所逼；商汤周武以革命的手段夺取政权，则是天命人愿；汉高祖和汉光武转战征伐，则是奠定功业之举。各因其天运大势而得天下。他感叹：顺应天时大势的意义实在是太大了！所谓人心所向，是指用在得人。他引述范晔之论：凡帝业之失、祭祀之绝，其由盛至衰以至败亡的过程，自然是有原因的。夏商周三代由贪宠女色致祸，嬴氏秦朝因奢汰暴虐灭亡，西汉因外戚专权而崩溃，东汉则因宦官之祸而倾覆。自秦汉至周隋，观察其兴亡轨迹，虽然也有命运天数的因素，但大体说来，得天下者，皆因有贤人豪杰的辅佐，能为百姓兴利除害；失天下者，皆因任用奸佞小人、奢侈无度所致。孔子说：“以约失之者鲜矣。”又说：“远佞人，去僻恶。”这些话都是很有见地的。你看，赵蕤强调的还是识人用人的重要。

《七雄略》和《三国权》则通过“七雄逐鹿”和“三国相争”这两个恢弘惨烈、可歌可泣的特殊历史时代的特殊历史现象的展示，活生生血淋淋地阐释了纵横家学派的谋略思想。苏秦、张仪的纵横捭阖，诸葛孔明的隆中运筹；六国纵亲以御强秦，孙刘联合以抗曹操；秦王的远交近攻，曹操的各个击破；六国的覆灭，三国的归一……这

两个英雄辈出的伟大时代有太多的相似之处，这里还暂且不去说那“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”的战争苦难。赵蕤在展示史实、凸显谋略的同时，笔锋一转，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战略性课题：时势造英雄，而这不断造出英雄的“时势”又是怎么造成的呢？或者说，如何才能维持天下一统，实现长治久安，使苏秦、张仪之徒无用武之地呢？

赵蕤说，周朝统治天下历时八百余年，周朝后期，周王室衰微，诸侯也就恣意横行，不以周天子为意了。虽然东周时期王室衰微，但周朝仍能枝叶相持，各国诸侯依然扶持着周王室，周天子名义上仍然是天下的共主。其间虽然也有楚王问鼎、晋侯请隧（请用天子葬仪）等不轨之图谋出现，但都被姬姓诸侯所扼制。难道当时就没有奸雄吗？端赖诸侯对周王室的维护啊！谚语所谓“百足之虫，至死不僵，扶之者众”，讲的不正是这个道理吗？及秦始皇一统海内，鉴于周朝诸侯强大、王室衰弱的教训，废封建，立郡县，其子弟也沦为匹夫百姓，功臣虽然也勤勉效力，拥有统治城邑大都的权力，但却没有尺寸之封地，皇帝一人宰制天下，独擅其利。然而，陈胜、吴广以一介匹夫振臂一呼，群雄蜂起，秦帝国顷刻间土崩瓦解。陈胜、吴广、刘邦、项羽等布衣百姓之所以敢于唤起民众与天子抗衡，除了秦政酷暴、百姓思乱的因素之外，更在于秦王孤身一人，使他们毫无诸侯勤王的担忧。赵蕤据此得出结论：采用郡县制统治国家，易使百姓萌生篡逆之心；采用五等封建制统治国家，又容易遭致诸侯横暴的祸端。但综合衡量，封建制还是优于郡县制的。鉴于西汉诸侯王中，大者强者反、弱者小者忠的特点，赵蕤认为，贾谊的“众建诸侯而少其力”的建议不失为治国安邦的两全之策。

第四，人生智慧之杂说。其实，智慧并不太好“说”。但赵蕤“说”了。准确地说，他说的并不是智慧本身，而是提出了在一些特殊的困难和问题面前，智慧应该如何应对的问题。意识到智慧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，这本身也是智慧。因此，这里所讲的“人生智慧”，

正是赵蕤体验人情之复杂、感悟人生之艰难的智慧。

试举几例。人心如面而又“厚貌深情”，虽然人情必于相应的事物中显现，故有“钓情七法”，但茫茫人海，芸芸众生，“七法”绝难包打天下人心。所以智如孔子，也愤然说道：“予欲无言。”这是讲钓情之难、说人之难。魏将乐羊率军攻打中山国，其子在中山，中山国君煮了乐羊的儿子并送给乐羊一杯肉羹，乐羊忍住眼泪，一饮而尽，以示必战的决心。魏文侯十分感动，说：“乐羊为了我而吃了自己亲生儿子的肉。”而有人却向魏文侯进谗言说：“自己儿子的肉尚且吃得下去，还有谁的肉不能吃呢！”乐羊凯旋而归，魏文侯奖赏了乐羊的战功但却因此怀疑其心的残忍。这是讲忠君之难。孔子说，君子贞洁正直但不必诚实（“君子贞而不谅”）。又说“信近于义，言可覆也”。他的意思是说只要符合义的原则，不必讲求诚信，所谓“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直在其中矣”。义者，宜也。难道诚信不“宜”吗？这是讲信守义之难。父子兄弟君臣之间，“贤”是可以依靠的吗？狐卷子说，贤也靠不住。做父亲的贤超不过唐尧，但他的儿子丹朱却被尧流放了；做儿子的贤超不过舜，但他却被自己的父亲瞽叟囚拘；做兄长的贤超不过舜，但他的弟弟象却傲慢无礼；做弟弟的贤超不过周公，但他的哥哥管叔和蔡叔都被他杀掉了；做臣子的贤超不过商汤、周武，但他们分别讨灭了自己的君王夏桀和商纣。这讲的是恃贤之难。人之常情是：越是恩情深的人，对他的敬养须特别谨慎周到；特别亲爱的人，其要求也特别细腻周到。关系亲密而得不到特殊的对待，谁能不产生怨恨的情绪呢？由此可知，所谓忿怨的情绪，恰恰是亲人之间的一种感情；所谓恩情，正是怨恨赖以产生的源泉。这讲的是人情的恩怨纠葛。其他诸如取予之道、命运之数、祸福之变、人格与环境、理想与现实，等等，赵蕤都细致入微，逐一论列。所以称这一部分内容为社会之总览、人生之百科，亦不为过。限于篇幅，笔者在这里就不逐一评述了。

至于第五部分，用兵理论之总结，则是对《孙子》军事思想的总结与阐发，此不赘言。

以上从五个方面对《长短经》作了简略介绍，分析与讲评仅为笔者的一得之见，挂一漏万亦在所难免。《长短经》博大精深，但愿笔者的一得之见能够成为催动读者进一步体悟、思考 and 创新的激石，使赵蕤的谋略思想在这竞争激烈的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。

“花外春来路，芳草不曾遮。”这才是谋略的真谛。

此次整理《长短经》，底本采自《四库全书》，并参校其他版本，择善而从。注文为赵蕤本人对文义的阐发，现限于篇幅，此次将注文一并删去，并无伤大体。本书注译过程中，亚伟、亚杰、方泥、若雨、东方、朝朝、方明、安然诸君或查找资料，或抄录书稿，或校对书稿，在此谨表谢忱。

刘国建

2006年10月

